

“五四与南洋：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专号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Nanyang: Special Issue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五四在南洋的思想轨迹： 以《新国民杂志》 (1919-1923)为探讨对象

The Ideological Trajector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Nanyang:
A Study of the *Sin Kuo Min Journal* in Singapore during 1919-1923

梁家迳

(LEONG Karh Chuen)

摘要

1919年10月1日，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正式面世。由于其大胆采用了白话文章、抨击旧礼教伦常、鼓吹各式新思潮，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南洋五四期间进步的报刊。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新国民杂志》的研究多偏向文学之分析，并没有从事于思想传播的探讨。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因为该刊于创刊之初就已言明以传播实业与教育思想为宗旨。所以若要为该刊于南洋扮演的五四知识传播者的角色进行准确的定位，首先就必须得回顾其于传播实业与教育内容所建立起的思想体系与脉络。通过了解《新国民杂志》在思想内容上的抉择，方能进一步揭示其在南洋五四新思潮中所留下的思想轨迹，并为其定位。

关键词：《新国民杂志》、五四新思潮、实业、教育、思想轨迹

Abstract

On October 1, 1919, the *Sin Kuo Min Journal* made its debut as a supplement to the *Sin Kuo Min Daily*, a newspaper based in Singapore. Owing to its intrepid adoption of vernacular Chinese, and its denunciation of the feudal code of ethics as well as its advocacy of modern thoughts, this journal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progressive public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Nanyang. However, it is worth to note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the *Sin Kuo Min Journal* mostly emphasize on literature analysis rather than discussing its dissemination of ideas. This aspect is important a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publishing the journal was to spread the ideas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refor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Sin Kuo Min Journal*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Nanyang,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built for the transmission of ideas about industry and education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y understanding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chosen by the *Sin Kuo Min Journal*, then only it is possible to pursue the ideological trajectories and historical role played by this journal dur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Nanyang.

Keywords: *Sin Kuo Min Journal*, May Fourth new thoughts, industry, education, ideological trajectories

一、前言

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或五四运动时期，¹ 是近代中国新报业兴起之时。在这一时期，近代中国的各家报业纷纷大事革新，增设副刊以让各种主义与思潮争相表达，形成针锋相对的五四思想世界。也正值这一黄金时期，新加坡的《新国民日报》于1919年10月1日正式面世，² 并同时于报刊内新设副刊——《新国民杂志》一栏。

《新国民杂志》由创刊开始，就由该报的总编辑张叔耐兼任主编。该副刊大胆采用白话文章，鼓吹中国五四运动新思潮，甚至专门刊登新文学作品、白话诗等，积极推广新文化运动。但有趣的是，有关于《新国民杂志》的研究却都只集中在新文学又或文学传播上的作用，³ 并通过其在新文学所展示的激进倾向将其定位为进步的报刊。如此的做法不仅忽略了《新国民杂志》在五四新知识与思想上传播的全貌，更忽略了该副刊一开始设立的主旨：“一是实业；二是教育。”（张叔耐1919a：2）这无疑使

得《新国民杂志》在传达五四新思潮的报刊形态与面貌、功能与方向有失偏颇。

因而，若要探讨《新国民杂志》在南洋传播五四新思潮当中所扮演的角色，重新梳理其在新思潮倡导之中的思想脉络就成了首要任务。其主要可分成三个层面来进行，即：（一）了解报刊本身的定位以及其对副刊的作用与影响上的认知；（二）分析以实业与教育为新思潮主要内容的传播形式与思想背景；（三）对比南洋与中国在传播新思潮形式之间的异同。本文将通过这三个层面的讨论，重构《新国民杂志》所形成的舆论形式，以进一步揭示其在传播五四新思潮中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与架构。

二、报刊与副刊的自我定位

（一）《国民日报》与《新国民日报》

对于《新国民日报》的定位，应先从其前身——《国民日报》谈起。毕竟《新国民日报》虽然改名复刊，并声称为“一个新纪元”（张叔耐1919b: 2），但对于报社的运作而言，其实更多是一个“传承”的过程而非一个彻底大转变。所以张叔耐在《新国民日报》复刊之日的〈例言〉当中就写道：

本报与社会相别忽忽已两个月了，有劳诸君垂念询问，实在感激不尽……第一桩，就是这句话了，便是言论尽可自由，而以不背于居留地政府的法律为范围。第二桩，本报的宗旨，是促进共和国民的程途，发挥平民政治的意义。要使得我们侨界同胞，人人趋于进化的方向。第三桩，志愿，要改良社会，鼓吹教育，提倡实业，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引诱吾们同胞，使得人人脑筋里印着极大的爱情，这爱情是什么，便是中华民国四个大字。这个三桩是大的，便是本报的大纲。

（张叔耐1919b: 2）

在这篇〈例言〉当中，有两点就体现出“传承”的轨迹。第一点，为形

式上的“传承”。虽然张叔耐并非《国民日报》时期的总编辑，但在其看来，《国民日报》与《新国民日报》其实就是一体的。所以当其在复刊之时并未将《新国民日报》与之前的做出严格区分，反倒是仍然称之为“本报与社会相别忽忽已两个月”。第二点，则是思想上的“传承”。该报在复刊之后仍然遵循《国民日报》时期“以锐利之言，拥护真共和”（崔贵强1993：21）的宗旨。这一宗旨的传承，不仅仅是报刊的思路与理念，也同时与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有关。《国民日报》的经理——陈新政与《新国民日报》的经理——谢文进皆为南洋的国民党党员。所以当《国民日报》改名并且复刊为《新国民日报》之时，其本身的政治立场并未改变。谢文进（1928）于《新国民日报》九周年报庆之时更着文直言道：“夫新国民日报者，由国民党人所产生。”（2）

虽然可见到其直接的“传承”，但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改变与发展却不可被忽略。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国民日报》对于“拥护真共和”的方法有所不同。《国民日报》提倡“拥护真共和”的原因从一开始的反对袁世凯，到后来的反对军阀，都维持着一种以政论性为主的报刊性质。⁴但到了《新国民日报》时期，“拥护共和”的政论性质却转而变成了“促进共和”以及“发挥平民政治”的启蒙性质。这与五四运动期间兴起的“舆论领袖论”有着极大的关联。其论述可从杜威于北京大学22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讲中窥之一二：

只凭了宪法和种种规律来治理国家，这个时代过去了。近世国家，无论什么事情处理，都要依趋舆论底方向：舆论就是真实的政府，真实的指挥……要养成制成舆论底“领袖”：凭他们去指导人民，使全国人民对于政府各样事情底处理，有明白的赞成，也有明白的反对。然后才能有社会底“力”，才能有真实地民治。

（杜威1920：198）

在这一层思潮的推动下，报业始而形成一种如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言之跨区域公共空间。该公共空间所指的是，在一个无形的、

想象性的舆论共同体中，以共同的话题将分散在各地甚至于全世界的陌生人结合为公众。正因为有着这一层认知，报纸不再仅仅为一个以政论性质为主的论政者，也同时不会只停留在一个事实真相为主的生产者的形象上，反而会形成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有着直接动员作用的特殊空间。启蒙者与被启蒙者的形态，也因此更为鲜明。

值得注意的是，启蒙性质的形态虽是《新国民日报》时期才出现，但其与“拥护共和”时期的政论性质却有着一个相同点——“精英主义”。两者皆被一种以匡扶济世为己任又或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贯穿，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其秉持着对舆论生产、流动权力与知识上的掌握，成为了知识的生产者。进而，以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为主的氛围，就成了《新国民杂志》诞生的环境。

（二）《新国民杂志》与“守门人”

据我个人的观察，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态度可叫做“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在实际上表现时，有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我们随便翻开这两三年以来的新杂志与报纸，便可以看出这两种的趋势。

（胡适1959：45）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报纸与杂志的内涵如何其实很难一言概括，但却可从胡适于〈纪念五四〉一文中所谈看出大概的情况。其所言之“研究问题”⁵与“输入学理”就可见于《新国民杂志》从创刊以来所开辟的诸多栏目之中，其中就可见〈科学〉、〈新思潮〉、〈新知识〉、〈新发明〉、〈新鼓吹〉、〈新体诗〉、〈小说〉、〈杂文〉、〈杂录〉、〈传记〉、〈词坛〉、〈新译述〉、〈教育界〉、〈教育研究〉、〈实业界〉、〈商业调查〉、〈妇女问题〉等等。但得留意的是，在诸多的问题研究与学理输入的课题当中，《新国民杂志》并非一概而谈，更多是着重于“实业”

与“教育”两项的讨论。为此，张叔耐（1919c）解释道：

要说这个缘故，先要论这杂志栏的价值……而这个实业界和教育界两种，却极有杂志的价值。我们南洋同侨所极应当注意的。这两界既不能归入国内要闻栏中，又不能归入世界要闻栏中。若要独开一栏，又嫌资料太少，所以竟归入于杂志栏中，作为本栏的一种紧要标目，当家柱石。杂志中又此两种，亦可借以自重。而阅者于阅看这些助兴趣文字之间，得此一二正经新闻，亦可以换换眼光，便是这两种标目。插在杂志栏中，也更觉得堂皇重要，比插在别栏内，尤其可以醒目些，惹得动人注意。这两个当家人，也能借以自重了。（2）

在这一层的解释当中，张叔耐虽然为《新国民杂志》的诞生作出一定的回应，但仍然有两个问题得进一步探讨与追问。第一，为什么张叔耐会在复刊与创立《新国民杂志》之际就提出杂志（副刊）的价值一说？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是否有着什么关联？第二，为什么在选择以实业与教育为主要的出发点之后，却又强调这两项内容资料太少？有关于实业与教育的议题，其实在五四运动前后就已然有着讨论，并且可见于中国的各个报刊与杂志，如《教育杂志》、《教育世界》、《中国实业杂志》、《实业浅说》、《建设杂志》等等。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张叔耐对这两项内容产生了并不充裕的看法与说法？

虽然有着层层疑问，但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里的发展趋势寻觅，即可看出端倪。其中，就是在这一个文化转型的重要阶段当中，报纸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报纸从最初一开始没有副刊，到后来在报纸的版面上有着一个被称之为“报屁股”的小栏目，再到五四期间有着孙伏园（1959）所称之为“学术性但又比较趣味化”（2）的改变，让副刊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过程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在如此的一个转化过程当中，近代中国里重要的副刊如《晨报》的《晨报附镌》以及《时事新报》的《学灯》等都在不停地反思与强调副刊在报刊中的价值所在。换言之，《新国民杂志》的兴起正是五四新文化潮流中的一员。也正是在这

一潮流之中，《新国民杂志》选择了五四新文化潮流中“提倡实业，发展教育”的时代思想。

可是，既然《新国民杂志》已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于相同的步伐当中，那为什么张叔耐仍会强调实业与教育相关的内容并不充裕呢？难道说是张叔耐对中国的报刊与杂志的教育与实业方面的讨论并不熟悉？答案却是否定的。若从实业与教育的稿件刊登状况来看，就可以发现来自《东方杂志》、《新青年》、《建设杂志》等的转载文。⁶也就是说，张叔耐对这些相关的讨论其实极为熟悉，其所言之“资料太少”所指的应该是南洋地区对这两项议题的意见交流并不多。所以与之相关的内容并不像刊登新文学的形式一般，有着诸多的投稿文件，反而单纯是以转载又或者本报记者的文章为主。也因此，如此的一种刊登方式产生了与近代中国副刊不同的启蒙形态。即，不是编者与读者“双方都是自由交流主体……平等的交流与对话”（王玉春2012：182）的启蒙与被启蒙的交替形式，而是一个由编者抉择思想的单方面启蒙与被启蒙的形式。相较于有着诸多投稿的新文学栏目，《新国民杂志》却并未以其为中心，张叔耐为之云：

至于这些诗词小品、小说谐文，都不过用以补助余兴而已。但是也不是胡乱拉着的。第一是不背本报的主义。第二是补助学问及道德第三是促进社会的进化。虽则嬉笑寓言，却也含着正经道理，便是衍敷衍于东方，滑稽诙谐的意思。一则因为普通心理，庄言逆耳，科诨动听；一则因为文语难详，陋辞易解。

为此，新文学在《新国民杂志》上的价值更多是一种依附性质，以紧贴社会思潮、新闻时政为主。这造成南洋新文学的某种特点，也同时是其局限之处。本来是一个编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渠道，却无形中只成为一种辅助，而核心之处则是以编者的抉择为主。

这样的编辑状况与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现代社会心理学开创者、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Kurt Levin）在研究信息流通的方式时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不谋而合。其（1947）于Social Planning and Action Research一文写道：

信息总是沿着含有门区的某些渠道流动，在那里，或是根据公正无私的规定，或是根据“守门人”的个人意见，对信息或商品是否被允许进入渠道或继续在渠道里流动做出决定。（145）

质言之，“守门人”的作用就是一个接受者、把关者、传播者，三者合一的角色。由于“守门人”负责对信息的制作与过滤，所以他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信息，传播什么样的信息，突出什么样的信息，甚至淡化什么样的信息。

因此，若要还原《新国民杂志》的思想取向，其实并不难。只要能通过《新国民杂志》对实业与教育信息判断与处理的过程有所了解，即能进一步重构张叔耐与其编辑团队在南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留下的思想轨迹。

三、实业与教育之讨论

对于实业与教育的内容分布，主要是在〈教育研究〉、〈教育界〉与〈实业界〉三个栏目。期间也可从〈杂文〉、〈新译述〉、〈杂录〉等栏目得到相关零散的内容。问题在于，该如何界定这些内容的时间脉络？更准确而言，就是如何厘清相关的内容是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思想轨迹？毕竟从1919年创刊开始直到1933年为止，⁷《新国民杂志》一直都处于活跃的状态。虽然其内容与编辑上有着各式的进步与不同的改变，但却不曾有着新的公告提示内容与主旨的更动。那么该如何对此作出区分呢？

若从大趋势来看，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止于1923年，前后共8年。在8年期间，可从政治格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看出始末之缘由。从政治格局而言，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所带来的反帝国运动，到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无法从日本取回山东造成了反日情绪之高涨。但到1923年，原本的反日情绪逐渐转向了国共两党的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斗争。这对社会文化方面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中，1915年《新青年》以新文化思想

启蒙为目的创刊，但却在1923年不再以其为目标，转而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为职责。如此的转变昭示着原本社会文化层面的斗争已逐渐转向政治层面的斗争，也同时代表着新文化运动已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⁸

相较于大趋势下的新文化运动，《新国民杂志》的思想启蒙性质就显得慢了不少。其前身《国民日报》由于早期的党报定位，一直到《新国民杂志》的面世才可谓有着思想启蒙的性质，以改良社会、鼓励教育、提倡实业为职，并开始与新文化运动接轨。值得一问的是，起步较慢的《新国民杂志》是否也与大趋势一样于1923年开始逐渐转向呢？虽然《新国民杂志》并未有着通告又或者新的〈例言〉提示宗旨的改变，但仍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1923年1月25日的〈本报特别布告〉当中所言：

本报为尊重国际上地位之关系起见，特改变编辑方针，以后对于经济、实业教育……等栏特别扩张资料。至于言论方针，务以开发民智、增高社会知识为主，以符合环境之要求。（2）

在这一则通告当中，《新国民日报》所谓之改变编辑方针其实指的就是将《新国民杂志》的实业内容另立栏目，并在第15页设立《经济》一栏。另立之意在于将《新国民杂志》的实业内容从原本的“实业救国”转向以新加坡社会发展与需求为主。⁹也就是说，编辑方针的改动看似为简单的实业内容扩充，但却同时标示着《新国民杂志》的内容已然与五四期间的救国内容有所不同。

因而，若要讨论《新国民杂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思想轨迹，以其大趋势背景与《经济》栏目设立的时间线为界，或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项。即，探讨从1919年10月1日《新国民杂志》创刊至1923年1月15日《经济》栏目的设立之间的实业与教育内容，以重塑其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所建立的知识桥梁。

（一）实业之讨论

于20世纪初期，中国涌现了一批提倡实业救国的群体，其中就包括张

蹇、汤寿潜等为代表的实业家，以及以康有为、严复、汪康年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实业家还是知识分子，皆通过报刊杂志撰写文章，发表个别振兴实业的计划。在《新国民杂志》面世之际，恰逢孙中山所著的〈发展实业计划〉¹⁰（*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翻译成中文广传之时。有着国民党背景的《新国民杂志》，毫无疑问的，也就成为了在南洋宣传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前线。

由于孙中山的〈发展实业计划〉篇幅较长，所以《新国民杂志》花了整整一个月来续登该文。其不仅体现了《新国民杂志》对该文的重视，也同时可从文中所谈到的几个要点看到《新国民杂志》对实业内容的基本思想轮廓。其主要可见于〈发展实业计划〉一文三续之处：

故余今陈一策，可使中国开一新市场，既以销自产之货，又能销外国所产，两不相妨。其策如左¹¹：（甲）交通之开发……（乙）南港之开辟……（丙）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设备……（丁）水力之发展（戊）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之大工厂，以供上列各项之需（己）矿业之发展（庚）农业之发展（辛）蒙古新疆之灌溉（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癸）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孙中山1919a: 14）

孙中山所提出的这十项建议当中又划分成六个计划，即：第一计划，北方区域的建设；第二计划，东部区域的建设；第三计划，南部区域的建设；第四计划，全国铁路建设的整体规划；第五计划，国民衣、食、住、行与教育相关的印刷业的计划；第六计划，冶矿工业的综合规划。前四个计划为根本工业之发达方法，后两个计划则为工业所需之外力辅助法。《新国民杂志》的实业内容就是以此二者为主轴，作为介绍实业知识的基本架构。

在这个架构下，可见的根本工业之发达方法的代表性文章有〈电气制钢与工业制造之关系〉（1919年12月11日）、〈中国电话事业之前途〉（1920年1月27日）、〈拟办汕头药化工艺厂意见书〉（1920年2月7日）、

〈药化工艺释义〉（1920年2月10日）、〈小制造厂〉（1922年5月24日）等等。工业所需之外力辅助法相关的介绍文则有〈橡皮实业之将来〉（1919年11月27日）、〈晋省改良羊种谭〉（1920年2月21日）、〈广济四大煤矿之近状〉（1920年2月27日）、〈中国制纸业之现况〉（1919年11月18日）、〈江西矿业之发达〉（1920年1月24日）、〈养鸡家育雏之注意〉（1922年5月22日）等等。期间偶尔亦可见中国以外又或者是与南洋实业界相关的讨论文如〈吾过赴法工业展览会之机会〉（1919年11月19日）、〈兴办南洋中国车之建议〉¹²（1920年1月12日）、〈德国之煤铁与航业〉（1920年1月26日）、〈西报论我国实业之前途〉（1920年2月20日）、〈南洋橡皮之新生命〉（1921年4月5日）等等。

由于其实业内容主要循着孙中山的思想脉络，并以介绍各行各业为文，所以其所建立的实业知识体系其实与孙中山所谈无异。那么得进一步询问的是，为什么孙中山会强调与提倡实业呢？为此，孙中山（1912）曾于〈论筹筑铁路事致宋教仁函〉¹³一文当中就提及其中的缘由：

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259）

对其而言，救国之根本在于民。若要保障在政治上所追求的人权、民主、自由，必须得先有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发展，并以维持人民的能动性来激活政治上的改变。所以孙中山（1919b）于〈发展实业计划〉的结论当中，其所提及的“人民将一律享受近代文明之乐矣”（14），并不仅仅为实业在人民经济能力上的补强，更是对改变中国政治氛围的一剂强心剂。当国家得以开辟财源之时，则“少年的人有教育，壮年的人有职业，老年的人有养活……全国男女，无论老少，都可以享乐”（孙中山1924a：462）。

换言之，遵循了孙中山实业思维模式的《新国民杂志》，同样也在实业思想上体现出渐进的模式。其通过对各行各业以及实业知识的介绍，以

让中国步入渐进改良的步伐当中。在这个步伐中，以实业为奠基，尔后再以教育使人民觉醒，以形成“真共和”。¹⁴ 这也就对应了《新国民杂志》一开始所强调，以实业与教育为思潮的“当家柱石”。从而达到逐步扩充每个人的自由，并且形成人人共享幸福自由社会的理想。

（二）教育之讨论

但有趣的是，虽然《新国民杂志》在实业思想上体现出渐进的思维模式，却在教育的问题上表现出既激进但又保守的矛盾现象。激进之处于《新国民杂志》创刊之初就有所显现，其于〈教育革命论〉一文中就提出对教育革命的激进看法：

（一）怎么叫做教育革命？就是推翻旧的教育，改造一个新的教育。（二）为什么要教育革命？因为现在的教育不良，非根本改造不可。（三）如何的教育革命？从形式上说，将现在不良的教育制度革除，另换新的制度，从内容上说，要求当今教育家、教育者，革面洗心，舍去旧习惯，换个新精神……试看那些教育家，何尝不满口的“道德”、“人格”、“热心”、“爱国”，可是“听其言观其行”实在信不过。但这是道德问题，小子何敢妄谈？只好用“不良”二字，促一班教育家、教育者的反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罢。

（晓红1919：14）

对其而言，中国的传统伦理是造成中国教育不振的根本根源。所以若要进行革命，首要任务就是替代以及摒除阻碍革命的儒家旧观念。与之相同的激进看法，以及对传统伦理的抗拒，也常见于《新国民杂志》中的其他文章。如，〈论中国科学不发达之原因〉当中就直言道“那知一辈子老顽固家，偏偏要来干涉。他并不知道社会的败坏，是由他们的旧学说旧道德造成的”（健飞1919：14），又或者〈无题〉所提到的“三十年前的读书人，闭口便是希圣希贤……社会上还有生气吗？”（大可1920：14），就是明显的例子。

也因为如此，造成中国教育不振的旧教育系统就被革新者称之为“使社会不进化的、静的、不动的、不变化的”（斗罗1921a：14）。若要为之革新，就必须代之以“动的、进化的、向前进的、使社会变化的”（斗罗1921b：14）西方新教育系统。但是其所谓之舍旧谋新并非只是单纯教育系统上的转换，更是根本思想上的转换，以不旋踵而仍复旧观。所以虽然很常可以看到《新国民杂志》刊登有关于教育法讨论的文章，如〈法国注重儿童教育之计划〉（1919年11月24日）、〈美国新创之残废人工学校〉（1919年11月26日）、〈青年心理及教育青年之方针〉（1920年3月4日）、〈美国之儿童教育〉（1920年4月30日）等等，但却也不可忽略同时也刊有如陈独秀（1920）于〈近代西方教育〉¹⁵一文对西方教育精神之说。其云：

吾人的教育，既然必须取法西洋，吾人就应该晓得近代西洋教育的真相、真精神是什么，然后所办的教育才真是教育不是科举，才真是西洋教育不是中国教育。不然像我们中国模仿西法创办学校已经数十年，而成效毫无。学校处数固属过少，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的学校，所教的无非是中国腐旧的经史文学。就是死读几本外国文和理科教科书，也是去近代西洋教育精神尚远……若要晓得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有几种大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被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真说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14）

陈独秀坚持认为，既然旧教育系统已然被儒家伦理所腐蚀，那么只将教材更换并不能根治教育不振的问题。所以，其所提出的西洋教育精神之精髓所在，乃是改造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的激进看法。换而言之，关键并不在于学习西洋学说，而是要摒弃原本的中国习性，并以西洋之精神学习西洋之学说。因而，即使于杂志内可见〈法国注重儿童教育之计划〉提倡“智德体”三种教育方式，但其所提到之“德”离儒家伦理所谈之“德”甚远。

然而，如此激进的看法却不见于《新国民杂志》为教育所提出的另一个替代方案——白话文之提倡当中。与之相关的代表性文章有〈西报论白话文之功效〉（1920年1月26日）、〈湖南人文化运动〉（1920年2月27日）、〈白话论〉（1920年3月10日）、〈文字革命之研究〉（1920年3月20日）、〈国语统一问题〉（1921年4月26日）等等。这些文章虽然有着常见的提倡白话文之论调，即认为白话可使普通人更容易了解文字，甚至可促进国民之自觉心，但却不乏对旧时文字的敬意。其中〈文字革命之研究〉的论调就是如此，其云：

文以达意，意尽而止。孔子所谓辞达而已矣是也。古人作文，本非先欲作文，而后四处搜罗意思也。乃先有意而后为文也。后人不知此，本无意也，而欲作文。于是之乎者也，填塞满纸，究之皆是空言。然此乃后人不学之过，而非文字本体之过也。

（胡怀琛1920：14）

胡氏所言基本就是在不否定，甚至是认同旧时文字的价值为前提的情况下，方对白话文之价值加以论述。这一种论述方式与先前论及儒家旧价值的抗拒态度，显然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新国民杂志》偶尔会有着如〈西报论白话文之功效〉里头称旧文字为“艰深虽读，惟少数人能懂”（无名1920：14），但却仍不忘补上其有“文学高深”之意。

更让人惊讶的是，《新国民杂志》提倡白话文教育的方式不仅仅建立在了对旧文字价值的认同上，更是在提倡以白话文教育的方法上一反先前对西洋教育精神之重视。其中以〈小说应列入学校国文课程中及其教授方法〉一文为例，就明显与“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以及“是启发的，而非被灌输的”之西方教育精神不符。其写道：

那些学生，年纪很轻，不知利害。看小说不喜欢那关于社会及科学的，专喜欢那爱情的、艳情的，以致一个人自命多情……或年纪轻轻，便存了厌世的心，去求仙学佛。你想想他，将来还会发达吗？

（余青心1920a：14）

但是要防一件流弊。是什么呢？就是除功课以外，绝对禁止学生私自阅看小说，以防无人指点，自己误会，发生小说会引坏人的事。

（余青心1920b：14）

小说的教育固然需要被引导，但若按照余氏之意要向“发达”的路径看齐，那么岂非又回到了旧教育系统的弊端所在了吗？甚者，在余氏的介绍下，小说的引导方式更具有着禁止学生私下阅读之见。如此之说无疑违背了西方教育所谈之“是启发的，而非被灌输的”精神了。

整体而言，《新国民杂志》在教育的议题上体现出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其同时持有者五四时期激进革命者的冲劲，却又同时具有期保守以及调和主义的思想。激进与保守对峙的现象确实常见于近代中国五四时期之中，但若一道出现在同一份报刊上却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新国民杂志》的矛盾现象并非如同近代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交流与对峙的形态，而是一个身为“守门人”在知识传播桥梁建构上出现的自我矛盾现象。

四、“守门人”与知识传播之渠道

如前所述，《新国民杂志》在创刊之初虽然以实业与教育为当家柱石，但其一开始就已意识到实业与教育在当地的信息交流颇为缺乏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层缺失，《新国民杂志》将己身定位为南洋五四知识的“守门人”，将中国五四知识进行筛选之后传至南洋。进而，虽然于杂志中可常见陈独秀、张士一、郭秉文、胡怀琛等人之见解，但却都是从中国转载而来，且至少有着一定的时间差。¹⁶ 这样的方式导致原本在中国五四言论空间共存的各种“声音”，浓缩成了《新国民杂志》个体在南洋的意识形态之体现。

其形态与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言之“独语”形态无异，造成一个封闭的、统一的、不变的状态。在巴赫金看来，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价值，所以思想真正的形态只有在人们的交往过程

当中，才能被揭示出来。其为之云：

思想不是生活在孤立的个人意识之中，它如果仅仅留在这里，就会退化以致死亡。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人的想法要想成为真正的思想，即成为思想观点，必须是在同他人另一个思想的积极交往之中。这他人的另一个思想，体现在他人的声音中，就是体现在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连接点上，思想才得以产生并开始生活。

（巴赫金1998：114）

在《新国民杂志》所营造的环境当中，〈实业界〉基本就是循着孙中山的思想脉络为主，为各项实业进行介绍，并未有着进一步的讨论或与之对话之文。至于教育方面的讨论，虽然有着激进如陈独秀之文，尔后又有着保守如胡怀琛之文，但两者之间并无任何交集，甚至可说是相互产生矛盾。因而，两个当家柱石可说是没有思想交流之活力。

由于其处于一个封闭且没有活力的思想状态下，所以即使出现了“五四新思潮价值取向”¹⁷上的混乱现象，其也无法从思想交流中获知。毕竟，在五四期间，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个形态并非一个相互排斥的存在。两者之间可以凭藉着“政治上的激进或保守”¹⁸与“文化上的激进或保守”¹⁹两个不同的坐标同时存在。换句话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并不代表着文化上也一定是全盘反传统。许纪霖（1992）于〈激进与保守的迷惑〉一文当中就有着如此一说，其云：

如果说在晚清传统的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大致同构，文化上的保守或激进也导致相应的现实政治取向的话，那么民国之后由于先后建立的各种政治秩序，无论是北洋的军阀政治，国民党的党治国家模式，还是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与传统文化价值发生了相当的疏离，因此文化上的全盘反传统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比如胡适是众所公认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想领袖，但他的政治取向却是相当温和的……孙中山的政治纲领在清末民初可谓是最激进的，但他对中国的政治哲学和伦理哲学却十分

推重……（137）

但在一个没有讨论活力的思想状态下，《新国民杂志》只能凭着自身的南洋国民党背景作出判断，从而导致其无法严格区分在价值取向上政治与文化坐标的不同所带来的失衡。身为南洋地区的国民党宣传前线，兼任《新国民日报》与《新国民杂志》总编辑的张叔耐可谓有着极为激进的政治意识。其中1921年4月至9月之间与持有保守态度的《叻报》所展开有关“共和还是帝制”的笔战，就可见其激进之态。其于〈极甘为亡国奴之狗彘〉一文直言道：

妖报不服共和故，因之而遂亦反对中山总统，夫妖报之不服共和，果使为帝制而发耶；是则虽已为民国之叛贼，而自其目的之实。

（鸠²⁰ 1921：2）

张叔耐斥责《叻报》不懂得追求个人权利，也不懂得民治法制，只是一味从法理上分析论政，并且强调外国列强之承认与否，是为“妖言惑众”²¹。其坚持认为，国内之改革不能要求外国列强之逐步承认，得是直接顺从民意实行共和之制。倘若一味看外国之眼色，岂非纵容他国干涉一国之内政？整体之论述，极为激进。

在如此激进的政治思维影响下，《新国民杂志》虽然按照孙中山的实业思想进行宣传，但却会很容易将其之后的思想本质激进化，将其上升至全盘西化之态。其激进化之处在于，将孙中山在政治革命形式与文化方面的革命形式重叠。若从孙中山的实业与教育思想上看，可以发现其发展实业就是要解决人民的物质需求，以便于建立一个基础为教育又或人民在精神上的需求提供保障。其所提倡的教育之改革可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待，即“外求于物”与“内求于心”。外者，就是通过教育的工具理性价值，让人民有科学知识以从事让中国富强之事业；内者，则是通过体育、德育、智育三项来改良人格救国。孙氏之教育革新确实是建立在了强烈的救国意识上，但却强调修齐治平、忠孝仁义等儒家伦理，甚至曾明言“中

国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孙中山1924b：46）。对其而言，旧教育固然盘根错节，但若只是因国民性问题而摒除一切，则教育或学问的道德价值沦落，无法造福社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换言之，孙氏之实业思想确实是建立在了强烈的救国意识上，但却并未因此放弃尝试融合中国本土与外来思想资源来实现文化的重建。即，是一个以培育市民社会为主的渐进环节，也同时是一种社会启蒙式的文化革命形式。

反观，《新国民杂志》虽然循着孙氏的实业思想进行论述，但却在这一基础上注入政治革命的激进色彩。其所注入的政治革命色彩，就是此前所提及的“不服共和，果使为帝制而发耶”的激进反动态度。其所认同的教育改革，也必须与共和制度之改革一般，需根除之。倘若不以共和之制为首，则必为帝制之遗孤。所以当这一种激进的政治根除式的改革态度延续到了教育制度改革上的讨论之时，就会忽略实业与教育原本的渐进模式，并将其定位成旧教育制度的全面改造。其中最为符合这一想法的，莫过于陈独秀所强调的伦理革命。其为之云：

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谋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仍复旧观者，此自然必然之事也。

（陈独秀1916：8）

陈独秀的伦理革命在于将西方自由平等的观念代替儒家的礼教纲纪，以西方的个人主义代替中国的家族主义。其所主张的启蒙主旨在于彻底的国民性改造，具有唯精神论的启蒙主义倾向。更具体而言，其反儒家的伦理革命主要是将重点摆放在在民主价值上的政治启蒙，而并非孙中山與杜亞泉二人的社会启蒙一般。是故，就演变成《新国民杂志》在文化革命渐进模式上体现出激进的政治革命形式。

但问题在于，《新国民杂志》并未因此就延续其在文化革命上的激进形式，反而是在教育的另一议题——白话文之教育，回到保守的态度上。既然《新国民杂志》在教育改革上承接了政治革命的激进形式，为何又会回到保守调和的状态呢？这或许与两点有关。第一，当谈及儒家伦理的旧

教育制度取与舍的问题之时，由于其涉及“根治”的问题，《新国民杂志》需要采取的是一种大趋势的态度表决形态。所以其只能在取与舍之间做一个选择，而其选择无疑将会是与其激进的政治思维相同的答案。但当来到白话文的教育问题上，其所涉及的已经不是一个取舍式的“白话或不白话”的问题，而是“如何白话”的疑惑。所以其采取的方案，也就是第二点的关键所在——精英主义。精英主义的体现，就在于知识分子如何将心目中的“规范知识”传递给大众。毕竟，对当时正在转型中的知识分子而言，其本来的传统士大夫角色依旧健在。对此，罗志田在对胡适等人的新文学与白话革命的论述上，就有过详细的叙述。其写道：

传统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两造的区分简明，功能清晰。

（罗志田2005：146）

同样的，身为“守门人”的《新国民杂志》，本来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体现。对于知识上的筛选与传递，其可谓是以自身的行动证明了可行性。正是由于教化大众的职责所在，让其意识到了教育改革之决策者必须回到教育者本身。大众之受教读物、受教程度，皆与教育者本身息息相关。这也导致《新国民杂志》在体现了激进的教育革命形态之后，又回到保守调和的状态之中。

整体而论，《新国民杂志》在南洋的浓缩型五四知识渠道，虽然同时体现出五四新文化期间可见的激进与保守的两种启蒙模式，但却与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有所不同。在近代中国五四期间所见的新文化思潮，有着政治与文化层面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交叉的关系。可是，在南洋所见的五四知识却是一个相互矛盾，且充满政治激进意识形态的存在。其所体现出来的不仅是一种政治激进与文化保守的错位，甚至将文化保守的原意替代之，让大众无法准确掌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所在。或许也因为如此的背景使然之下，除了受限于读者群众的数量，²²五四新知识的传播渠道上的矛盾、不活跃之状态也加剧了其在南洋少被提及的现象。

五、结语

20世纪20年代与中国有着一洋之隔的南洋，无论是在政治、思潮、教育各方面的发展都受到了中国的影响，更与中国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中国与南洋之间的信息传递也就成了当时报刊上的一大特色。可特色并非单指贡献，同时更包含着发展中复杂的思想轨迹。《新国民杂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身为南洋地区新文学、新思想、新道德主张的前线，但其所建构的“畸形”五四知识体系却少为人所知。

其鼓吹五四运动新思潮，攻击旧礼教伦常，但又提倡孙中山与杜亚泉等人倡导的实业与教育之渐进模式；其大胆采用白话文，开辟新文艺，刊登新文学作品，但又在白话教育上持有者保守调和之势。种种的矛盾现象，都使得原本复杂的五四意识形态更难呈现在南洋的读者群面前。明明有着保守调和之势，却会在更多的时候会被激进的改革形势、爱国主义所掩盖，使得《新国民杂志》的文坛上充满着如同鲁迅所言之“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会动弹的”激进论调。

也因此，致使原本就稀少的《新国民杂志》研究，将目光局限在新思潮、反封建、攻击旧礼教的层面上，并称之为进步的表现。但若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并重新整理其为五四所铺盖的知识体系，就可以发现《新国民杂志》在五四思想的草稿上最原本的细节与思路其实并非只有进步，反而是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错位现象。

注释

- 1 本文所谈之“新文化运动”又或“五四运动”皆指广义而言，也就是一场可追溯到1917年新文学运动与“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倡导所带来的新思想运动，并不仅仅只是狭义所代表之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运动而已。
- 2 《新国民日报》的前身为《国民日报》，并在1919年8月6日遭到查封停刊。关于《国民日报》被停刊的理由有两种说法。一者是由于五四运动爆发期间屡登文字抵制日货，遭到当地政府的勒令停刊。另一者则是由于发表一篇批评殖民地政治的社论，被殖民地政府查封停刊。（钟声2014：35）
- 3 有关《新国民杂志》的研究其实非常少，可见的有李志于2004年的《中国现代文

学研究丛刊》所著的〈境外的新文学园地——五四时期南洋地区文艺副刊《新国民杂志》研究〉与其稍后于2013年的《华人文化研究》所写〈早期南洋华文小说的当代解读——文学传播学语境中的新马早期“改良社会”华文小说〉而已。即使是最近期（2014年）由钟声所著的《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年-1928年》，也纯属以“文艺副刊”的形式讨论《新国民杂志》。

- 4 有关于《国民日报》创刊原意，可从两处寻得。一则于《国民日报》总编辑雷铁崖于〈《国民日报》发刊词〉所体现出来的反袁之辞。其云：“美新之文宣扬于国内，劝进之表预备于袖中，元冕大裘之制复矣，苍虬玉辂之仪备矣……噫嘻怪哉！是岂高阳之邱、沙瓦之水果能钟毓英灵，统治中夏耶？而何以歌熙皞而颂圣神者遍国中也？吾侪不敏，徒为疾首之言，诸君未明，请作诛心之论。”（雷铁崖1914：419）二则为邹鲁（1938）于《中国国民党史稿》中所叙述的详情中得知。其云：“《国民日报》，乃南洋党员鉴于袁世凯之横暴，军阀之肆毒，各埠原日之保皇报，尽变为保袁报。言论背谬，较前尤甚。对本党则下井加石，对政府非袁莫属……爰由庇能（中翻之Penang，也就是今日之檳城）党员……发起组织《国民日报》。于是庇能并举陈新政、邱明昶，而与新加坡党员磋商。几经曲折，卒底于成。”（522）
- 5 胡适更是在“研究问题”一项凜冽出了十种的“研究问题”，其分别是：（一）孔教问题、（二）文学改革问题、（三）国语统一问题、（四）女子解放问题、（五）贞操问题、（六）礼教问题、（七）教育改良问题、（八）婚姻问题、（九）父子问题、（十）戏剧改良问题等等。
- 6 虽说可以发现《新国民杂志》的刊登文为《新青年》、《建设杂志》等的转载文，但却不能因此而断定其转载的时差。因为《新国民杂志》的转载文皆并未注明原本转载自何处，其仅仅注明了文章的作者。恰巧这些文章又在五四时期多被各个报刊杂志转载，所以很难确定《新国民杂志》的编辑当时是从何处转载此文。比如《新国民杂志》于1921年所转载的张士一之〈国语统一问题〉，原本刊于1911年《新青年》第3卷第4期，但后来亦可见于1920年的《时事新报》之副刊——《学灯》当中。
- 7 虽然《新国民日报》是于1941年元旦迁至吉隆坡之后不久才停刊，但本文如今所能看到的文本资料仅为创刊开始到1933年7月18日，所以并不能进一步考证《新国民杂志》于停刊前仍然是处于活跃状态。
- 8 详可参见张玉法（1994）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1915-1923〉一文，页285-286。
- 9 虽言《新国民杂志》的实业内容开始转向新加坡社会发展需求为主，但并不代表整体的“实业救国”之论已然消失匿迹。以1924年1月7日的《经济》栏目为例，其实就仍然可见该报转载傅产生的〈发展中国实业的先决问题〉一文。该文所持有的论调就是“实业救国”之论调。但若以整体《经济》栏目的刊登状况而论，该日的文章却是以南洋地区的实业介绍文居多，如〈荷印度输入马来

亚之矿物)、《马来半岛之木材》、《马来生产业》等,就是与《发展中国实业的先决问题》一文同刊的。那么谈南洋之实业居多就等同于不爱国了吗?答案是否认的。其就如同《新国民杂志》1919年12月18日所转载的白华之《我们为什么爱国?》(原文刊登于1919年第1卷第7期《改造与解放》)一文所提:“我们是为着中国国家的光荣伟大而创造新中国么?这又是一班世界主义国家所反对的‘国家主义了’……我们爱国是因为爱世界,是尽我们一部分发展世界事业的责任”。换言之,“实业救国”的爱国之心并未就因内容的转向而消失匿迹,反而是以一种世界主义的爱国心呈现在了南洋的读者面前。为此,《新国民杂志》所要推动的爱国之心,并非只是爱中国之心,而是一个世界主义之爱国心。甚者,或更可推论说,其所持有的爱国心其实一直以来都并未改变,只不过是在创刊之初受到了南洋实业资料匮乏之限制而已,所以张叔耐才会在一开始称之为“资料太少”。

- 10 此前虽然有提到《新国民杂志》的转载文一般并未注明转载于何处,但孙氏的《发展实业计划》一文却是例外。该文注明转载于《建设杂志》,因而可以确定该文源自1919年8月第1卷第1期的《建设杂志》。
- 11 报刊由右至左,因而文称之为左。
- 12 该文为《实业界》少见的投稿文。其之所以可被区分为投稿文,在于《实业界》在撰稿者名字之处严明“旅星洪溪野人投稿”。倘若为报业记者所撰之文,其只会注明撰稿人之名又或笔名,如“季鹤”(撰《南洋橡皮之新生命》)、“李大中”(撰《药化工艺释义》)等。虽然是《实业界》少见的投稿文,但也可以从“旅星”二字当中获知《新国民杂志》其实有着来自中国知识分子的投稿。
- 13 根据《民立报》(1919年8月22日)所载,其原标题应为“致宋遯初书”。
- 14 对于“真共和”与实业以及教育之间关系,杜亚泉(1917)于《东方杂志》亦有所提及,其云:“真共和之成立,不外二因:一为国内农工商业之发展,二为国民教育之普及……必更经过若干时期,而后因实业之发达与教育之普及,真共和乃渐渐成立。”(2)其所强调只“若干时期”,无疑让渐进模式的形态更为明显。
- 15 该文原刊于1917年7月1日《新青年》第3卷第5期。
- 16 准确的时间差暂无法考证,现阶段唯一能够确定的仅仅为其转载的孙氏《发展实业计划》一文,即2个月的时间差。
- 17 所谓的“五四新思潮价值取向”,指的就是五四时期出现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
- 18 所谓政治层面的激进或保守,主要取决于其对现实社会政治秩序的认同态度。倘若要追求的是根本解决,以推到一切重新建立者,则为激进;倘若主张以现存系统为基础,加之以技术性调整,则为保守。
- 19 所谓文化上的激进或保守,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倘若追求的是全盘推到,以西方文化为主者,为激进;倘若文化的诠释仍然在本土的框内进行,

则为保守。

- 20 此为张叔耐之笔名。
- 21 也因此，《新国民日报》之后的论战当中一律将《叻报》称之为“妖报”。
- 22 《新国民日报》为南洋当时数一数二的华文报纸，且在销售量上领先其他华文报。（王慷鼎1987：51）但其领先之日销量，却只有3000份，与近代中国庞大的读者群无法相比。

参考文献

- 巴赫金1998。《诗学与访谈》（白春仁、顾亚铃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白华1919。〈我们为什么爱国？〉（杂文）。《新国民杂志》，12月18日。
- 陈独秀1916。〈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期，页8-12。
- 陈独秀1920。〈近代西洋教育〉（教育界）。《新国民杂志》，3月23日。
- 崔贵强1993。《新加坡华文报刊与报人》。新加坡：海天文化企业私人有限公司。
- 大可1920。〈无题〉（随感录）。《新国民杂志》，2月13日。
- 斗罗1921a。〈旧教育与新教育的差异〉（教育界）。《新国民杂志》，11月24日。
- 斗罗1921b。〈旧教育与新教育的差异〉（教育界）。《新国民杂志》，11月25日。
- 杜威1920。〈大学与舆论〉（高尚德整理）。《新潮》，第2卷第3期，页196-198。
- 杜亚泉1917。〈真共和不能以武力之求论〉。《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页1-4。
- 胡怀琛1920。〈文字革命之研究〉（杂文）。《新国民杂志》。3月23日。
- 胡适1959。〈纪念五四〉。载国立北京大学台湾同学会（主编），《五四爱国运动四十周年纪念刊》。台北：北京大学台湾同学会。
- 健飞1919。〈论中国科学不发达之原因〉（科学）。《新国民杂志》，12月3日。
- 雷铁崖1914。〈《国民日报》发刊词〉。载唐文权（主编），《雷铁崖文集》（页419-426）。武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罗志田2005。〈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载许纪霖主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页127-161）。北京：新星出版社。
- 孙伏园1956。〈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北京日报》，10月17日。
- 孙中山1912。〈论筹筑铁路事致宋教仁函〉。载秦晓仪（主编），《国父全集》第四册（页259）。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 孙中山1919a。〈发展实业计划〉（实业界）。《新国民杂志》，10月13日。
- 孙中山1924a。〈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载秦晓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三册（页451-462）。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 孙中山1924b。〈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载秦晓仪（主编），《国父全集》第一册（页45-54）。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

- 王慷鼎1987。《新加坡华文报刊史论集》。新加坡：新加坡新社。
- 王玉春2012。《空间与对话：“五四”报刊通信栏研究》。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
- 无名1920。〈西报论白话文之功效〉（杂文）。《新国民杂志》。1月26日。
- 新国民杂志编辑团队1923。〈本报特别布告〉。《新国民日报》，1月25日。
- 晓红1919。〈教育革命论〉（杂文）。《新国民杂志》，10月16日。
- 谢文进1928。〈本报九周年纪念感言〉（社论）。《新国民日报》，10月2日。
- 许纪霖1992。〈激进与保守的迷惑〉。《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11期，页137-140。
- 余青心1920a。〈小说应列入学校文课程中及其教授方法〉（教育研究）。10月27日。
- 余青心1920b。〈小说应列入学校文课程中及其教授方法〉（教育研究）。10月30日。
- 张叔耐1919a。〈例言〉（社论）。《新国民日报》，10月4日。
- 张叔耐1919b。〈例言〉（社论）。《新国民日报》，10月1日。
- 张叔耐1919c。〈例言〉（社论）。《新国民日报》，10月6日。
- 张玉法1994。〈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闻与言论，1915-1923〉。《中央研究院近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页285-329。
- 钟声2014。《新加坡华文报〈新国民日报〉研究：（1919年-1928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论文，未出版，长春。
- 邹鲁1938。《中国国民党史稿》。长沙：商务印书馆。
- Levin, Kurt 1947. *Frontiers in Group Dynamics: II. Channels of Group Life; Social Planning and Action Research. Human Relations*, 1(2), 143-153.